

人類造就了瘟疫

陳秋坤

——介紹麥尼爾教授新著：「瘟疫與人類」

一、歷史寫作的趨勢

歷史真是人類文化裏的一大寶藏。人類因有文字而創造了歷史，而歷史也無時無刻不在反映着人類長遠的心路歷程。歷史學家或以歷史寫作爲業的人，日夜與古人古物爲伍，鑽研於前代先輩們的先行事蹟，爬梳典籍文物，爲文著述，再再能發人深省。

大多數的歷史學家就好像是人類文化裏辛勤耕耘的園丁，終其一生，耗盡心神，或爲解析前代的政績事業，或爲釐清晦暗不明的先史軌跡，日夜匪懈。幸運者，得以書成名山大作，傳諸幽遠；然則，大部份的史家，則多半喟嘆歷史資料之浩瀚無邊，驚悸於歷

史女神的多重面貌，而終未得其旨，因而遲遲未敢下手著述，抑鬱以終，但盼來者，承宗接續，庶幾有成。

多數的歷史學者窮其畢生精力，多半只能就自己所知範圍，研究出專精的成果。他們或者綜合前代諸家的說辭，或者發抒前人所未具及的歷史真實，但是，一般說來，却都只能就有限的題材或一定的範圍，提出個別的貢獻而已。只有少數一些學者，天份特高，見識廣闊，除了能充分把握住自己耕耘的範圍之外，還能高瞻遠矚，神遊四海，就前人或同輩的專論著述之中，擇取精華，貫穿成篇，從人類的過往遺跡之中，找出連貫的線索，而能解釋出一定意義的命題來

，這在西方史學方面，尤能如此。吉朋（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試圖以各種史料，說明「羅馬帝國之衰敗，是由於基督教的散播」這個主題。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的「西方的沒落」，則企圖從人類的幾個文明中，找出線索，以闡釋作者所謂「文明都以同樣的循環方式，從萌芽、成熟乃至於沒落」的命題。

類似這類的著作，學院派的史學家大都抱持不敢苟同的態度。他們批評這類著作對複雜的歷史現象體認得太過簡單，對許多歷史事件的認識，也普遍流於浮面的分析，因而，由這些不紮實的「歷史根據」所累積而成的命題，顯然就不能站穩腳根。有一陣子，歐美學界對類似的著作，却都抱着不信任的態度，轉而要求歷史研究者要專精於某一史實的探究，嚴格分析某一歷史事件的豐富內涵，不要輕易涉及湯恩比「歷史研究」之類的泛論著作。

然而，儘管如此，人們對自己本身的長遠演化「歷史」，還是止不住探究的興味。即使學院內的歷史專業者，也無時在問：「人是怎麼活過來的問題？」而這類的問題並不是一朝一代的專篇論文所能完滿解

答的，於是乎，以一個明確而意義深遠的主題涵蓋數百年，甚至數千年歷史軌跡的寫作方式，終免不了會再引發史學工作者的興趣。某些歷史學者到後來，也承認吉朋、史賓格勒、湯恩比等人的著作，固然不能清楚地解釋歷史的全貌，但這樣的研究途徑，到底也能指出瞭解過去的一些線索，縱使他們的立論基礎略顯薄弱，但也不是不能改善的。就在這些背景下，美國芝加哥大學近代史教授麥尼爾（William H. McNeill）先生寫成「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這本書，出版未久，即獲當年美國國家優良著作獎。

二、文化傳播的意義

「西方的興起」係以文化傳播學的概念，就世界各大文明藉戰爭、貿易、交通、移民等方式而互相交流、衝擊的歷史痕跡，鉤爬出西方文明之所以能躍昇為世界重要文明的靈感，從而借助大量近人精心寫就的大小「博士級」論著，佐證他這份「歷史洞識」的可靠性。麥教授的這本大著，在時間方面，從希臘城邦時代講到二次戰後的世界；在空間方面，則跨越

全球，歐亞之間大草原的陸路交通，美洲與歐洲之間的海路交通等洲際交流方式，都成為麥教授筆下的論證。

最近，麥教授又以他驚人的精力與組織能力，推出一本三百六十九頁厚的大著，題為「瘟疫與人類」(*Plagues and Peoples*)。我們在此雖無法及時看到原著，但透過書評家，也是牛津大學聖·約翰學院(St. John's College)近代史教授托瑪士(Keith Thomas)的詳細評介，也可提供我們一個清晰的圖片。這本書也是以世界史的眼光，觀察歷史上的各種傳染疾病對人類歷史的步調所產生的衝擊。由傳染病的起源以及散播的因素，重新檢討在歷史學界早有定論的重大歷史事件。以傳染病史的眼光來看人類的演化，所得到的印象，跟以往以文化史、政治經濟史或社會史的角度來分析或解釋歷史所得的圖片，大異其趣，頗能令人耳目為之一新。譬如一般歷史教科書描述西元前四三〇——四二九年之間雅典與斯巴達的爭奪地中海的霸權，多半把雅典被斯巴達以及希臘半島同盟軍隊打敗的原因，歸之於斯巴達實施軍事獨裁統治，具有事權專一，組織效率迅速，戰鬪力

高昂等等優點，相對地，雅典便因實施城邦式的民主政治，而有組織鬆散，軍隊訓練不夠嚴謹，因而戰鬪力微弱等等缺點。看起來，斯巴達之能取代雅典而雄霸希臘臨海，是有明確的理由的；可是，麥教授卻從史籍中，找到證據，證明雅典陸軍在這段期間，曾因一場瘟疫而折損近乎四分之一的軍隊。因而，雅典的挫敗，固然不能否認當時斯巴達的雄厚軍力所具有的威力，但是，陣前兵士的大量損失，也不能說是一項極重要的因素。因此，政制的不同，只能算是其中的一項因子，不能據以解釋獨裁式的軍事統治就勝過城邦式的共和政治體系。

三、人類歷史在生物界的地位

麥教授認為，站在生物界的眼光看來，人類的歷史不過是整個生物演化過程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在生物的演化史上，人類正是製造生物浩劫的一大來源；人類對其周遭生物的迫害、衝擊，跟某些要人性命的傳染病對人體的傷害，是屬於同一類型的。早從舊石器時代人類開始以獵者的姿態捕獵周圍的生物，人類即挾其龐大的殺傷力，捕殺地上的吃草生物和肉食動物

。等到農耕發明之後，人類有了雛形的農業生活，開始把多餘的野生動物圈養在住區周圍；捕食的行爲才略爲收斂。從生物的滋育角度來看，人類人口之所以能日益繁殖、累積，必然是生態環境經過一番重整鉅變，才能讓出多餘的空間，讓人類大量繁生。

至於人類之所以能够長期生存下來，據麥教授的意见是因爲人類周圍的小病原（microparasitism）（泛指專門侵害人體的各種細微、不易見及的病菌所引起的病害。）和大病原（macroparasitism）（泛指任何具有戰士、搶劫和收稅等作用的大型生物，包括人類以及各種凶暴動物所造成的災害。）維持一種微妙的均衡關係所致。只要大、小病原任何一方發展過度，便會破壞這種均衡，而人類的生命也就面臨難以延續的危機。小病原傳染過份，固然危害人類的生命，而人類這個「大病原」若是過度捕殺各種製造食物的生物，人類也將難以自存。

對於大型的，可見到的「大病原」，諸如外來的侵略者或是社區內部的盜匪等等，人類可藉築城爲堡或籌組警察力量，鎮壓內外的侵襲。可是，對於細微的、不易觸及的小病原，人類却因未能清楚這些病原

的病情，非得等到近代醫學、醫藥的發達之後，有了顯微鏡之類的精密儀器，才能抓住病因，對症下藥。

在這些儀器或技術未出現之前，人類便只能靠無意識的生物自然調節方式，消極性地承受這些「小病原」的虐害。「瘟疫與人類」這本書的中心思想，便在強調人類與其身旁小病原，是靠著這種生物性的自然調節，雙方才維持一種內涵上改變但却不失均衡的關係。就殺傷率的程度而言，大病原對人類的殺害比率，反而要比小病原來得小。麥教授指出：廿世紀以前人類因傳染細菌而死亡的數字，要遠超過因彼此的爭戰殺伐而致死的人數。他甚至認爲，人類史上假藉戰爭或政爭而引發人類互相砍殺的現象，多半並不是人類意識下產物，推究其原，終究只是生物自然調節下的派生結果而已。

麥教授廣泛閱讀近代以來各地研究流行病的學者的報告，歸納出一件有趣的現象；他發覺人類與其周圍小病原居然維持着一種富於戲劇性的互動關係。病理學者曾證實：人類對初次接觸的細菌，幾乎毫無抗體可言。某一地區的民族初期感染到某一新病菌時，往往造成巨大的傷亡。可是，等到該民族消極地承受

到某一階段，那些殘存下來以及新生的人口身上，便能發出不可思議的抗體，逐漸縮小病菌的感染範圍；人口逐漸恢復之後，又跟小病菌回復到先前的「和平共存」關係。不過，這樣說，並不表示這些病菌就不再感染該地的人民。某些病菌在客觀環境未曾多大改變之下，蟄伏一段時間之後再度發出的病毒，反而要比原來的威力強烈數倍。不過，麥教授也指出，這種病毒——抗疫——再復發的循環過程，並不是命定的、一成不變的。人類的人口只要聚集到某一程度的密度，足以抗拒病毒的蔓延，那麼，有些病毒便會自動「降級」；原來是全社區的人都會感染的病菌，到這時便只有抵抗力較小的階層才會受到侵襲。譬如昔日人類的大患——麻疹，到今天，只成為小孩較易罹患的病症。至於人類抗疫時間的長度，麥教授以為，總要花上一百廿年至一百五十年，才能有效地控制住病菌的復發。但是，這並不表示，所有的病菌都能如此「擺平」，譬如某類老鼠身上的鼠疫，就一直不斷地威脅人類的生命，其他像流行性感冒，也只能有效地控制於一時，未多久又將有新併裂出來的流行病菌，傷害人類的健康。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的流行性

感冒，就曾造成近二千萬人口的死亡。然而，話說回來，人體內所能產生的抗體也真不可思議。麥教授就曾指出：歷史上最常出現病疫的地區，該地病菌的殺害能力反而是比較最為微弱的。

四、社會生活與外在環境的呼應

然而，人類與其身邊的小病原，也並不是全靠生理方面，或是單靠生物有機調節方式來維持均衡關係的。事實上，人類社會生活型態本身的變遷，也直接影響到小病原本質的發展和變化。人類每經過一次重大的生活「革命」，周圍的小病菌也會跟着調整傳染的廣度與深度。

據麥教授的觀察，人類史上要以下列這三種社會生活的變遷，最能影響小病原的性質：第一是捨漁獵而就農業生活；第二是人口密度的成長與集中，導致城居生活方式；第三是交通方式及交通範圍的改變與擴充，引發洲際文化、經濟交流的生活型態。

人類有了農耕生活，自然有許多明顯的好處，諸

如作物及地力的穩定；生活上跟動物隔離之後，減少帶菌動物感染的程度及機會等等，都是以前漁獵生活所欠缺的。西伯利亞大草原在開發之前，每年繁殖大量的土撥鼠，嚴重侵擾人體，但有了農耕作業之後，農民大量掘地翻土，原來藏在地表下的土撥鼠也就不像以前那樣大量繁殖了。然而，農耕生活之後的種種不良的副作用，却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麥教授指出，東方各國開始儲水、灌溉作物之後，大量感染了足以衰竭人類生活機能的白蟻，據估計，至今尚有一億左右的人口，還在承受這類病菌的侵襲。

再者，農耕之後，人口大量持續繁衍，許多地方便因種種地緣因素而聚集大量人口，人們逐漸便有了城居之類的集體生活方式。由農耕的散居到城市的集居，人們感染的病菌也跟着變質。有不少病菌，像麻疹即是，需要人口聚集到五十萬的地區才會傳染開來。麥教授指出，人類自西元前五百年左右開始有了城市生活之後，世界各主要文明區內的城市，即已醞釀孕育本身特有的「病原叢」，經由河水或空氣，向城市四周傳播。當時的防治方法是把鄉村人口經常引至城市居住，藉這種城鄉人口的流動，來防止城市人口

素質的僵化，以便消極性地壓抑病菌的孕發與傳播。

交通方式及交通路線的擴展，固然帶動區域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刺激各地文明的發展面向，但不能否認的，這種交通必然也將某一區域性的病菌帶到別個社區之內。前面已指出，人類對陌生的，未曾接觸過的病菌，特別容易感染，死傷也特別大。因此，各地政經文化交流的背後，也就是區域性病菌的相互感染。麥教授指出，西班牙人當年入侵新大陸的同時，也將隨身攜帶的天花、麻疹和流行性感官等病菌，散播給美洲印地安人，結果，有很多部落便因此而滅族滅種了。在歐洲人未到美洲領土之前，美洲地區根本沒有瘧疾和黃熱病之類的病毒；然而，十六世紀歐人相繼來此之後，墨西哥和秘魯兩地的原始住民却因這些病毒而死傷殆盡，最後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的人口。要不是如此，科特芝(Cortez)的六百人軍隊，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征服得了人口上百萬的阿芝特科帝國(Aztec Empire)。這個帝國的人口大都是墨西哥原始住民，他們在經歷了這場病菌的浩劫之後，直認為這是上帝對他們的懲罰了，整個民心渙散，也難怪要兵敗如山倒了。

不過，這種因交通導致不同區域的大量接觸，因而引發傳染病的現象，並不是只有被侵略地區才有的。歷史上，也有不少瘟疫，是由歐洲以外的民族帶着特殊的病菌感染到歐洲大陸，也因此而造成大量傷亡的事例。麥教授就曾指出一項鮮爲人道及的事實：西元第二世紀左右，歐亞陸路之間的交通頗爲頻繁，隔了不久，歐洲地區便於西元一六五(?)至一八〇年左右，初次感染亞洲大草原帶來的天花；接着在西元二五一(?)年至二六六年，又感染了麻疹，然後是西元五四二至五四三年腺鼠疫的猖獗。每一種瘟疫，在初期階段，都令歐洲人手足無措，人口大量死亡。如果說當年西班牙人以極少數的兵力征服了美洲大陸是不可思議的一件事，那麼，羅馬帝國的崩潰，又何嘗不是如此。瘟疫對人類歷史的改造，正有其不可忽視的一面。

五、文化交流的正反兩面

麥教授認爲，十八世紀以前歐洲與亞洲大陸之間的陸路以及歐洲與美洲之間的海上交通，固然造就了世界性的貿易市場，但也因此而孕育了一潭世界性的

病原。十四世紀期間，蒙古騎兵遠征歐洲，也把身上的特殊病菌，傳染給歐亞草原地帶的老鼠，造成歐洲史上死亡無數的「黑死病」事件；十八世紀初葉，崇尚勤勞節儉的英國清教徒，千辛萬苦移民到北美洲，他們懷抱着基督新教的倫理精神，製造且累積了用以榮耀上帝的財富，但也因爲勤奮流汗的關係而染上所謂的「英國汗疹」(English Sweat)。這種相互感染的全球性瘟疫，要等到十八世紀之後，因着交通的大革命以及近代醫藥、醫學方面的長足進步，才慢慢安頓下來，人類也從此跟小病原重新建立一種新的，比較穩定的均衡關係。全球交通的大革命是指蒙古人在歐亞大陸所打開的陸路交通網，以及歐洲人在海路方面的重大開發。因爲這些交通網的建立，人類對許多病菌也就逐漸能夠適應，體內增強不少抗體，不少病原也就侷限在本地發展，成爲個別區域性的瘟疫。醫藥與病理學方面的各項突破性發現，讓人類從此可以用「理性」及預防措施，對病菌加以有效的控制。不過，對於這一點，麥教授並不以爲它是人類出於人道主義的關懷而發出的「理性」行爲，相反的，他認爲這些醫學方面的成就，最初的動機多半是出於軍

事的需要，也是爲了滿足帝國主義往外擴張的需求而附帶來的。帝國主義者向其他地區擴張影響力時，爲了防範疾病的感染，才設立疾病防治或研究機構，以便順利控制屬下的「殖民地」。許多病理的發現，也就這樣產生了。說起來，也是頗富嘲弄意味的。

六、「瘟疫與人類」的評價

在「紐約書評」寫這篇評介的托瑪士教授認爲，麥尼爾教授的這本書，就性質而言，是屬於開創性的著作：他是第一位把歷史學與病理學合併起來，重新解釋人類行爲的學者；也是第一位把傳染疾病列入歷史重心，給它應有的地位的史學工作者。他的許多論調固然帶有試探性質，尙待檢驗，譬如他認爲小病原的「安頓」，是因爲人類在交通方面以小醫療方面的進步而促成的。這個論點，醫藥衛生專家恐怕就不會完全同意。他們會認爲營養的改善，衛生習慣以及公共衛生制度的建立，才是令病原「萎縮」的重要因素。然而，儘管如此，麥教授却是首先告訴我們，人類歷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或歷史演變，很少不含「傳染病」這個因子的。透過傳染病的歷史分析，不僅可讓

我們重新認識人口的成長與住居型態改變背後的另一層「生物意義」，而且，也讓我們在解釋羅馬帝國的崩潰、佛教與基督教的興起、歐洲的擴張、印度種姓制度的形成以及大英帝國的崛起等重要歷史現象時，體認到賦有負面效能的傳染病所具有的推動力量。

托瑪士教授的結論是：看過這本書之後，吾人將瞭解歷史上的各種重大傳染病，不是事出無因的偶發事實，而是「查有實據」的歷史真實現象。

七、一些感想

筆者時常有這樣的感觸：我國的歷史不可謂不長，而寫作歷史的傳統，也始終未嘗斷過。作爲中國文化特質之一的歷史綿延性，早已把中國文化的各個形象統攝成一體。然而，或許也因爲如此，我們在歷史著作上，往往只見其同，而少見其異。乃至於留給我們的歷史書，不是內容太過於龐雜，無所不包，因而不容易抓住重心；就是失之於過份簡單或流於一元化的解釋。前者如各級歷史教科書，乃至於市面所能見及的「中國通史」；後者便是各種用「泛政治」或三段論式的因果解析方式來解釋歷史現象的成書或論

文。或許是受時空的限制，到今天為止，我們還是難得看到有人以某個具有豐富內涵的命題，貫穿史實而寫就的歷史書本。我們也難得在現有的歷史論述文字之中——找到令人領悟「過去」、「現在」與「未來」是不可分割的一個連續體。

筆者這樣說，固然有以偏蓋全之嫌，也有以西方的著作來貶損我國優良作品的弊病，然而，這實在不是筆者寫此文章的原意。筆者要強調的是：我們不應形式主義式地高喊「歷史是全民的教育」。我們要做的，毋寧是以活潑而創意盎然的心靈，去接近，去爬梳豐富而複雜、矛盾的歷史事實。以不同的角度來剖析前人的腳步，讓當代人感染過去的「歷史」脈搏，從而創發性的引導我們的文化傳統，而不再讓它變成是被祇負的「文化遺產」。我們應該學習一點「歷史的教訓」，不能再重蹈五四的覆轍，以反傳統的態度來排斥固有的文化傳統。猶太籍社會學家艾深思達（S. N. Eisenstadt）就曾一再強調：「傳統的延續，乃是現代化成立的重要條件」。而這些智慧的培养，有一部份就要看我們的歷史學家或歷史工作者，以怎樣的取向和作品來教育國人了。

德華獻給您的暑假最佳禮物
林語堂叢書一套七折優待您

京華煙雲

張振玉譯

平裝 250元
精裝 100元

武則天

張振玉譯

八十自述

張振玉譯

紅牡丹

張振玉譯

重編白話本

中國傳奇小說

吾家——

林語堂女兒的日記

愛與諷刺

唐人街

□單本直接郵購九折，函購全套優待

如左：（掛號寄書）

□含精華煙雲普及本408元，優待285元
□含精華煙雲精裝本558元，優待390元

德華出版社 郵撥：102899
電話：8819142

40元 35元 40元 48元 25元 20元 50元